

关于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 几个问题的研究¹

Kampol Piyasirikul²

摘要

近几十年来，以蔡元培为研究对象的大量著作和论文不断地问世。研究范围涉及到蔡元培的政治活动、政治思想、教育思想、蔡元培与五四运动、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以及蔡元培与时人的关系等领域。研究者们对这些课题已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探讨与研究，也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中，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研究，相对而言是“热门话题”。笔者在阅读前人的大量相关研究之后，发现学术界在该题目的研究上基本达成了了一致。但在某些问题上，尚存在着分歧与争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文将首先对前人研究作简单的梳理与总结，再着重讨论目前学术界持不同意见的若干问题：1)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否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和授意；2) 蔡元培支持还是反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3) 关于蔡元培的辞职。最后笔者将提出对已有研究的几点思考与展望。

关键词：蔡元培、北京大学、五四运动

¹ 本文章是作者在 2013 年 7 月 25-26 日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成立 40 周年的“中国在东盟语境中：中国语言与文学新视野”国际会议上所发表的同名学术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² 泰国皇太后大学(Mae Fah Luang University)文学院中文系教师

一、就任北大校长之前的蔡元培的简介

蔡元培（1868–1940）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出身于翰林院编修。戊戌维新失败后，蔡元培对维新派持同情态度。他认为想要救国，首先必须培养人才。于是，他退出翰林，从事教育改革与革命救国活动。在 1902 到 1904 年的两年期间，他先后担任了中国教育会会长、爱国学社总理、上海爱国女学总理和编译所所长等教育界职位。此时他还担任他与朋友们一起组织的《俄事警闻日报》（后改为《警钟日报》）的主编。1904 年冬，光复会成立，蔡元培被选举为会长。1905 年加入同盟会。1907 年 5 月赴德国进莱比锡大学攻读近代西方哲学、伦理学和文学等专业。1911 年底回国。1912 年初蔡元培先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在任职教育总长期间，蔡元培对全国教育进行了若干重要改革，如改订教育宗旨、改革学制、修订课程及在小学中实行男女同校等等。但由于蔡元培对袁世凯独裁政权感到十分不满，他于是年 7 月与同盟会其他三位总长一同辞职，退出内阁，不与袁世凯合作。在来自政治界的压力下，他被迫于年冬再度赴德国。1913 年蔡元培受孙中山之召回国。是年 7 月办《公论晚报》呼吁讨袁，8 月反袁军事失败。于是，9 月他赴法国从事著译。1916 年 9 月，蔡元培在法国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廉的电报，催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1917 年 1 月 4 日蔡元培到北大正式就任北大校长。

二、蔡元培的北大改革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创造有利条件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中心。学术界一致认为这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与蔡元培对北大进行的改革和整顿是密不可分的。一般的著作和论文对五四运动爆发的阐述都追溯到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时期。他们认为蔡元培任校长后对北大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晚清戊戌变法的直接产物。民国元年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虽然民国初北大已进行过改革，但许多方面始终没有彻底整顿。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时，学校的封建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京官的子弟，还停留在前清科举时代，对研究学问毫无兴趣。他们把上大学作为做官发财的途径。针对这种恶劣的学风，蔡元培提出第一要改革的就是学生的观念。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典礼上，向学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与敬爱师友三项要求。他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大学生应为求学而来，而不应以进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他批评学生只想要做官，而对教师却不论其学问的浅深，只看其官阶的大小。学生对官阶大的教师非常拥戴，认为这些教师能成为他们升官的靠山。

为了扫除封建官僚的气氛，并提高学生对研究学问的兴趣，蔡元培首先对教师队伍进行了改造和整顿，挑选“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当时的北大，保守派的势力在文科中占有主要地位。因此蔡元培的教师整顿是从文科入手的。他聘请了一批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才。他就任校长不到十天，就聘请了《新青

年》主编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并请陈把《新青年》由上海搬到北京来办。继后蔡元培又聘任了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真才实学而思想进步的名家。至此，北大师生都踊跃参加到新文化运动中。宣传新文化与文学革命的《新青年》杂志颇受北大师生的欢迎。蔡元培也多次向该杂志投稿。

在理科方面，蔡元培聘请了当时知名的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璞任学长，还聘请了一些学有专长的教授，如李仲揆、王星拱、颜任光、朱家骅等。法科教员原来是由政府官吏兼任的。蔡元培增加了专任教员，有马寅初、高一涵、陈启修等知名学者。

在充实加强教师队伍的同时，蔡元培果断裁撤了一些没有学问、教学态度又差的中外教员。这引起了被开除的教员对蔡元培的不满，尤其是外籍教员。但蔡元培处之泰然，一直坚持其主张。通过这场大改革，北大教师队伍有了新的面貌。而且，北大一时就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另外，蔡元培还提出了著名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他认为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师，即使主张不同，但只要他们“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要“听他们自由发展”，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这就是说他选聘教师的唯一标准是学术造诣，而不问其学派或思想的新旧。本着这一办学方针，蔡元培既聘请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这样一批思想进步的人，同时又延聘了主张

复辟留长辫子的辜鸿铭、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刘师培和维护文言的黄侃等那些在政治上或学术上保守但学有专长的学者。

可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并不是毫无界限的。对于守旧派的教授，他是珍惜他们的真才实学的，希望学生能从他们那里得到渊博的知识，但并不允许他们向学生传播任何政治上的旧思想。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的提倡下，北大新旧派各自有自由发展其学术的空间。北大新派师生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以及《新潮》等刊物相继问世，以宣传反对封建伦理道德、鼓吹新思想为主要任务。同时，旧派则以《国故》月刊和孔子研究会为其维护封建礼教、反对科学和民主的主要阵地。新旧派的斗争充分地活跃了北大的学术气氛，有助于提高学生对研究学问的兴趣，并开阔了学生的眼界和思想。

蔡元培任校长前，北大学术空气稀薄，学生又没有高尚的课余活动。有钱的教师和学生生活糜烂，是妓院的常客。针对这种现象，蔡元培到北大任校长后，就积极提倡组织各种社团和研究会。为纠正学生四处游荡的恶习，他发起组织了进德会，提出不嫖、不赌、不做官等口号，以培养个人的道德修养。为提供正当的消遣，他推动设立了体育会、技击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社等团体。为鼓励研究学术的兴趣，他推动组织了新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化学研究会、数理学会等会社。为养成学生服务社会的能力，他推动组织了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教育讲演团与《新潮》、《国民》等

杂志，以发扬学生自主学习的精神。蔡元培还多次到各会发表演说，并兼任了好几个会社的会长，如新闻学研究会、进德会会长等。后来音乐会改为音乐传习所，他又兼任所长。通过上述几方面的改革，北大学术空气逐渐浓厚起来，学校风气也逐渐改变，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三、蔡元培同情爱国学生，保护学生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学术界一致认为点火人就是蔡元培，因为是他将此消息告知了学生。以至于在运动后的营救被捕学生以及引咎辞职的整个环节当中，蔡元培也表明了其同情和保护爱国学生的态度。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战胜国于 1919 年 1 月起在巴黎举行分赃的和平会议。中国也以战胜国的身份派南北政府的代表出席和会。在列强的操纵下，和会决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一切权益全部让与日本。蔡元培对该和会与中国代表的举动是十分关注的。他在得知此消息之后，于 5 月 2 日召集北大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对他们讲述了巴黎和会已决定将德国原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5 月 3 日蔡元培从汪大燮那里获悉国务院密电命令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他当即召集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告知这一消息。同日晚上，北大全体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法政专科、高等工业学校等十三个中等以上校学生代表

参加大会。大会最后决定于次日，即 5 月 4 日，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

5 月 4 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大会，发表演说，散发传单，高呼“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口号。后来爱国学生队伍先走向东交民巷外国驻华使馆区，但被军警阻止前进。于是，队伍又转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进发，冲破门墙，捣毁室内器物，痛打在曹宅的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警察总监吴炳湘率领大批军警当即捕去学生三十二人，其中有北大学生二十人。

事后，蔡元培与十三校校长一致认为此次运动若是学校运动，就应该由各校校长负起责任。于是，为营救被捕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先后奔赴了警察厅、教育部、国务院及总统府，向他们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在全国各界强烈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的压力下，北洋政府答应于 5 月 7 日将释放被捕学生三十二人，并提出不准学生参加五七国耻纪念日国民大会，以及各校学生从 5 月 7 日起一律复课两项要求。蔡元培等都表示同意这两项要求。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大和蔡元培变成了反动势力集中攻击的目标。随后几天，谋刺蔡校长、焚烧北大校舍、杀害北大学生等谣言纷纷四起。此时，蔡元培明知自己处于反动势力严重压力之下。但为营救被捕学生，保全北大，他仍持镇定态度。到被捕学生释放后，5 月 8 日晚，蔡元培才向北洋政府递送辞呈，并于 5 月 9 日晨，离京赴津。后来，他给北大学生写了信，表示他深

信此运动“纯出于爱国之热诚”，并表明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的心迹。

蔡的辞职引起了学界的强烈反应。先出来反应的是北大师生。他们向政府要求明令留蔡，并通电全国请求支援。北大教师还作出如蔡不留，即一致总辞职的决议。随后，北京各校学生与教职员也纷纷反应。至此，除拒绝签约、罢免曹、陆、章卖国贼的官职等外，挽留蔡校长便成了爱国学生向政府要求的内容之一。在各方面的劝促之下，蔡元培于 7 月 9 日表示放弃辞职。但因病尚未痊愈，暂时请蒋梦麟先生掌管校务。9 月 12 日蔡元培从杭州回到北京，并于 20 日正式到校办事。挽留蔡校长的成功意味着五四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四、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否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和授意

已有的关于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校史的著作和论文，绝大多数都认为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得到孙中山支持的，或受到孙中山授意。如萧超然（1988）等在其著作《北京大学校史》中指出，当蔡元培刚从法国回到上海时，“许多友人都劝他不可去北大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怕整顿不了；也有少数朋友劝他去，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去试一试。当时孙中山认为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力主就职。”

（萧超然，1988:53）萧超然（1995）在其专著《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又用同样的文字表述孙中山支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萧超然，1995: 69）。

又如高平叔（1986）也同样指出，“孙中山极力主张他去，认为这正好在北方传播革命思想”（高平叔，1986）。梁柱（1995）也对孙中山支持蔡元培接受北大校长一职进行分析说，“孙中山很重视开辟北方地区的革命工作，对蔡元培也很了解和信任。他认为，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该到那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去主持高等教育，这样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所以竭力主张蔡出任此职。”因而，梁柱认为“孙中山对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支持，对于蔡力排众议最后接受任命有重大影响。”（梁柱，1995：16-17）可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得到孙中山支持一说，已为许多研究者所采纳。

对此，据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北京大学校史馆副研究员杨琥（2004）最早提出异议。他指出，“蔡元培出长北大并非孙中山支持和指派”。通过对持此观点的论文进行考察，他指出此说法的来源根据“不外乎罗家伦和黄季陆的回忆，换言之，罗、黄二位是此一说法的始作俑者。”他反对这一说法的论点有三条，即有关蔡元培的原始材料不能证明这一说法；当时孙中山、蔡元培的政治活动、思想倾向分歧，指出二者正处于分歧状态；罗、黄二人的说法之误。他进行分析并指出，蔡元培的回忆、日记以及自述都没有直接提到孙中山主张蔡元培出长北大。另外，从考察 1916 年底到 1917 年初蔡元培任职时孙、蔡二人现有的交往材料方面来说，也没有涉及到蔡元培出长北大的相关讨论、协商之议。在政治与思想方面，当时孙、蔡二人也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立场。如在反袁问题上，孙主张武力讨袁，而蔡却主张以温和渐

进的方式反袁。在反袁结束后如何建国的问题上，孙主张实业救国，而蔡却主张力图从教育入手。基于以上分析，杨琥认为“孙中山不可能支持、赞同乃至指示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一职，而蔡元培也未必接受孙中山的主张。”另外，他指出，之所以罗家伦、黄季陆的回忆录有这种说法的表述，是因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史家，想为孙中山争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权。他解释说，“他们如果将蔡进北大论证为受孙支持或‘指派’，那末，孙中山领导了或指导了‘五四运动’，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结论。”

接着，杨琥又提出了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是出于几个内外在的原因。外在原因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北洋系、进步党（以梁启超为首）、国民党三派人士大合作，当时的政局气象为之一新。……为蔡出长北大提供了政府方面的支持。”；北洋政府教育部内江浙人士的人际网络，为蔡出长北大提供了又一便利条件。；北大内部的人事变动也为蔡出长北大创造了条件。而杨琥认为最重要的是出于内在的原因，即蔡元培“是怀抱着‘革新北大’，从改革大学教育入手塑造和培养新的人才，从而提高人民素质，实现祖国‘转危为安’的目的而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的。”（杨琥，2004）

随后，崔志海（2006）明确指出，“蔡元培出任校长并非人们所说，系孙中山授意，而是蔡本人的夙愿。”首先，崔志海认为，在蔡元培身上，“学者的气质远过于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气质”。他指出，蔡元培虽然加入了同盟会，但是他主要从事文化与教育活动。1913 年的“二次革命”期间，蔡元培已有意出长北

大，但因受到袁世凯的反对，未能如愿。随后，蔡元培赴欧从事教育活动。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蔡元培认为，想要振兴祖国，必须从改革教育、普及教育入手。由此，崔志海认为，“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的决定虽然获得了孙中山的支持，但这一决定并非出于孙中山的授意，而主要是由蔡元培本人做出的。”另外，他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在许多问题上蔡、孙二人持不同的态度进行分析。对此，蔡元培“多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发言，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倾向”。如在一战段祺瑞政府是否对德宣战的问题上，从不同的思想出发，蔡主张宣战，而孙坚决反对宣战。又在对北洋政府的对付方式问题上，孙坚持武力北伐，而蔡却“主张南北双方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统一”。他还指出，因蔡元培的言行违背了他的党派立场，他就受到了南方国民党人的严厉批评。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蔡元培显然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孙中山领导的南方国民党人在北方的代表。”他最后指出，由此推理，蔡元培出长北大并不是孙中山授意（崔志海，2006）。

五、蔡元培支持还是反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

在蔡元培是否支持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问题上，学术界颇有不同的看法与争论。大体可分为认为蔡元培对此运动持支持态度、反对态度以及既支持又反对态度等三派。认为蔡元培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有朱君、梁柱、李德明等人。朱君（1988）明确指出，“‘五四’爱国运动的首倡者是北京大学学生，蔡元培则是

青年学生爱国行动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将蔡元培把中国代表将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转告北大学生，以及蔡元培为营救被捕学生而奔走的行为理解为蔡支持此运动。另外，他还认为，5月3日晚上由北大学生代表召开的大会，“事先曾得到蔡元培的赞同”，而且，“散会后，蔡元培又召集学生代表谈话，对学生的爱国活动给予鼓励。”（未君，1988）

再者，梁柱（1995）也指出，“对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蔡元培始终是同情和支持的。”但他认为蔡元培对此运动的支持态度是有个变化的过程的。首先，从教育家的立场出发，蔡元培是“不很赞成”学生参加政治活动的。“但在实际上他对学生的政治活动，并不多加干涉；而他自己的思想，也是随着时代的步伐一起前进的，这在五四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梁柱，1995：78-79）而李德明（1998）同样认为，“在五四运动中，蔡元培对学生的爱国运动始终是同情和支持的。”他还一字不动地重复未君论文里的一段话，说5月3日晚上的学生大会的召开，“事先曾得到蔡元培的赞同。散会后，蔡元培又召集学生代表谈话，对学生的爱国活动给予鼓励。”（李德明，1998）

另一方面，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蔡元培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是持反对态度的。张寄谦（1979）指出，5月4日当学生队伍将要出发时，“从爱护同学出发，蔡元培出来劝阻”，“不赞同学生示威游行”（张寄谦，1979），并对爱国学生解释说游行不能扭转时局，反而会为反动当局提供摧残北大的口实。随后，高山（1999）认为，蔡元培改革北大是在当时北洋政府统治相对薄

弱的背景之下进行的，但“蔡元培主观上并不倡导学生投入的‘五四’运动。”（高山，1999）

对此问题，第三派研究者却认为蔡元培既支持，又反对五四学生爱国运动。黄崇法（1985）指出，“五四以后，蔡元培先前那种支持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色彩逐渐减退了，并转而把学生引导到纯学术研究的轨道上来。”他认为五四前后，蔡元培对学生爱国运动的态度有变化。事前支持，而事后却反对，并将其主要思想转向教育救国。他指出，蔡元培后来“把学生的罢课斗争看作是‘自杀政策’”。最后他对蔡元培的这种态度作出尖锐的评价，指出“这时候的蔡元培已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他把教育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而没有认识到教育同社会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黄崇法，1985）

魏授章（1989）以当时蔡元培的行为解释其矛盾的心理。魏授章指出，5月3日晚大会的召开，事先得到蔡元培的赞同。并且，会后蔡元培对学生代表谈话，给予鼓励。而“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教育家，他并不赞成学生示威游行，5月4日北大学生准备向天安门出发之际，蔡元培曾到场劝止。至于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更为蔡元培所反对，他认为这是‘骚扰之举’，‘做得过火’。”（魏授章，1989）

再者，崔志海（2006）明确表示，蔡元培对学生运动既持支持又持反对的态度，是不矛盾的，因为都是从其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出发的。崔志海认为，一方面“作为一个主张教育救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蔡元培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赞成或支持学生

运动。”，并举蔡元培在五四前后的言行来证明这一点。如 1918 年 5 月 2 日，蔡元培劝阻爱国学生前往总统府请愿抗议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19 年 7 月 23 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一方面对学生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告诫学生不要因政治问题而牺牲学业，呼吁同学们回到教育救国的道路上来”；1920 年 5 月，“蔡元培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中甚至将学生运动看作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自杀’举动；1921 年 6 月间，蔡元培对北京八校教职员因北洋政府积欠薪水和学校经费而罢课，认为有失教师风范，表示坚决反对等。”

同时，崔志海也认为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蔡元培是个支持五四运动的人。他指出，“在蔡元培看来，‘五四’便是属于‘不应干预’的学生运动，他对此显然持支持态度的。”崔志海将蔡元培在一战结束后在天安门露天讲台所作的演讲，蔡元培把国务院密电巴黎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转告北大学生，以及他积极地营救被捕学生，一直到他为保护学生与保全学校而辞职等言行看作是蔡元培对此运动持支持态度的表现。最后他总结说，“反对学生沉溺政治运动和支持五四运动，都是蔡元培的真实表现；这一看似矛盾的态度，在蔡元培身上并不矛盾，盖由其自由主义和爱国主义立场使然。”（崔志海，2006）

六、关于蔡元培的辞职

对于蔡元培辞职的问题，研究者们主要以蔡元培在天津与友人谈话的纪录为分析其辞职原因的资料。因此，已有的研究绝大多数认为蔡元培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几天辞职，是在受到北洋政府的压力的背景之下，蔡元培以自己的去职来换取保全北大学生和学校免遭当局的迫害。研究者们对蔡此举动给予了肯定。但是，同时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此问题作出不同的分析。如张寄谦（1979）指出，“蔡元培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没有大官僚、帝国主义作为靠山，不断受到反动势力的排挤打击”，因此面对当时来自反动势力的压力时，他“只能以辞职作为唯一的不对恶势力妥协的武器”（张寄谦，1979）。另外，殷小未（1996）对此评价说，“北洋政府统治黑暗，蔡元培无能为力，可以不合作，却不能彻底决裂。蔡元培的辞职启事，反应了他这一矛盾的心理，蔡元培的辞职出京是一种消极的抵抗。”（尹小未，1996）

针对此问题，王昊（2001）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王昊在其论文中指出，“蔡‘五四辞职’之原因并不是仅由他因为支持某一方而得罪于另一方这样一种简单关系反映的。”他从蔡元培与北洋政府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分析蔡辞职的原因。首先，王昊认为，蔡元培与北洋政府的关系并不像很多研究者那样认为是水火难容，但两者之间却有着“微妙的关系”。他指出，由于蔡元培的“党派色彩的日趋淡化”，因此其对北大的改革得到了当局的“默契”，否则北大难以出现学术民主、百家争鸣的局面。而

且，在蔡元培辞职出京的时候，若没有与北洋政府保持着“微妙关系”的背景，蔡就不可以最终“安然离去”。由此，他认为蔡的辞职“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受胁迫而去，其中也可能有一种主动的因素导致他的去职。”其次，本着学术至上的思想，蔡元培“对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持有谨慎的态度”。王昊指出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准备出发受到政府代表的阻拦之际，“蔡当时劝阻学生，提醒他们防止‘授人以柄’的告诫举动是有可能发生的。”从蔡元培去职后的言行来看，王昊认为，蔡元培对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行为是有所不满的。并且，他对蔡的去职提出疑问说，“蔡的去职之动作其中是否有警告学生的意味呢？”由此，他认为，“蔡元培的辞职决不是由简单一种原因造成的，而是由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王昊，2001）

七、对已有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总的来说，近几十年来的蔡元培与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研究的面几乎无不涉及。同时，研究者们也注意挖掘新的有关蔡元培的原始史料。就学术界尚存在着的一些争议，一部分研究者试图从更全面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而且大胆地提出与众不同的意见。但是，回顾这些研究，笔者认为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待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

第一，大部分研究所采用的史料是具有片面性的。如就蔡元培对学生爱国运动持什么态度的问题，由于许多研究者只凭几条史料，就做出判断，所以其观点难免具有片面性。即使后来有

一些研究者企图从更多的角度和立场，并采用更全的史料去研究，提出具有新意的观点，至今也是寥寥无几的。因此，注意采用史料的问题，尽量从更广的角度、立场，去挖掘新的史料，以避免研究的片面性，是使该研究向前迈进，成果更加完善的主要前提。

第二，主张跨学科的研究。关于蔡元培与五四时期的北大的以往研究，更多的是从其政治思想、身份以及教育思想的立场出发。这必将导致该研究出现很大的单一性和重复性的问题。拿蔡元培就任与去职北大校长一职的例子来说，很多研究者是根据当时其政治与教育思想进行探讨研究的，因此得出来的观点也难免具有单调性与重复性。而若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如心理学，就可以让我们对该问题有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可以填补以往研究的一些空白，丰富学术界的研究内容。

参考文献：

著作类

丁石孙、萧超然、梁柱等著. 1999. 《蔡元培研究集：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 13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平叔. 1980. 《蔡元培年谱》. 中华书局.

高平叔. 1984.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 中华书局.

高平叔. 1999. 《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二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高平叔、王世儒. 2000. 《蔡元培书信集》（上）. 浙江教育出版社.

梁柱、王世儒. 1995.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山西教育出版社.

萧超然. 1995.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

萧超然等编. 1988. 《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潮社. 1920.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上、下）. 北京大学出版部.

杨扬. 1997. 《蔡元培》. 上海三联书店.

期刊论文类

蔡慧琴. 1999. 《试论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2）.

陈平原. 2004. 《蔡元培与老北大》. 领导文萃，（2）.

楚保玲. 1997. 《“五四”时期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 南都学坛（哲学社会科学版），（5）.

崔志海. 2006. 《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角色再探讨》. 史学月刊，（1）.

董宝良. 2005. 《蔡元培整顿与改革北京大学的历史经验》. 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3）.

杜瑛. 2002. 《试论大学校长宽容角色的现实意义——蔡元培成功领导北京大学的启示》. 现代教育科学，（9）.

高平叔. 1986.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上）. 民国档案，（2）.

高平叔. 1986.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下）. 民国档案，（3）.

高平叔. 1998.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高山. 1999. 《从北大改造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天山论坛，（1-2）.

胡志坚. 2006. 《蔡元培北大改革的心理史学研究》. 大学教育

科学, (5).

黄崇法. 1985.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历史教学问题, (2).

李德明. 1998. 《蔡元培对“五四”的积极贡献》. 天府新论, (5).

梁柱. 1998. 《蔡元培革新北京大学》. 文史精华, (2).

刘锋. 2003. 《蔡元培北大改革成功原因剖析》. 湖南第一师范学报, 3 (2).

陆米强. 1999.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上海党史研究, (2).

罗家伦. 1990.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选刊). 鲁迅研究月刊, (5).

马句. 1999. 《缅怀五四运动的奠基人蔡元培先生》. 新视野, (3).

苗体君. 1999. 《蔡元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新探》. 广东社会科学, (3).

彭明. 1989.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和蔡元培》. 高校社会科学, (2).

苏爱荣. 2001. 《蔡元培的教育改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广东党史, (3).

孙颖. 2006. 《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与大学人事改革》. 市场周刊·理论研究, (8).

屠文淑. 1989. 《五四运动的先导蔡元培先生》.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王冬燕. 1995. 《蔡元培北京大学改革成功经验之启迪》. 黑龙江高教研究, (6).

王昊. 2001. 《蔡元培“五四辞职”探微》. 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4）.

王志彦、徐焕文. 2006. 《探析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改革成功的原因》.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

未君. 1988. 《简论蔡元培对“五四”运动的贡献》. 绍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

魏授章. 1989. 《试论五四运动前后的蔡元培》.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3）.

文庠. 1999.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党史纵览，（2）.

杨琥. 2004. 《蔡元培出长北京大学的前前后后》. 北京社会科学，（4）.

殷小未. 1996. 《五四运动蔡元培辞职出京》. 历史教学，（6）.

张寄谦. 1979. 《五四运动前后的蔡元培》. 北京大学学报，（3）.

张晓唯. 2005. 《蔡元培辞离北大以后》. 书屋，（6）.

周天度. 1986. 《关于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界的一项决议案——兼评蔡元培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近代史研究，（1）.

ABSTRACT

Questions about the Study of Cai Yuanpei and Peking Univers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Kampol Piyasirikul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and articles about Cai Yuanpei have been continuously published. This study involves a consideration of Cai's political activities, political thoughts, educational ideas, his involvement with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i's Peking University reform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him and other contemporaries. Not only have the researchers on these topics studied quite deeply, but they have also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obtaining new knowledge and publishing works for others to reference. Among this research, the study of Cai Yuanpei and Peking Univers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s a "popular topic" relative to some others. After studying a great number of related research papers, the writer h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uniform recognition reached on this topic. However, the academic world is still divided on some issues. Thus, this article makes a brief summary of

the content of related research papers, and then discusses the issues in dispute, including 1) Was Cai Yuanpei supported and incited by Dr.Sun Yat-sen to become the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2) Did Cai Yuanpei support or oppos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3) Why did Cai Yuanpei resign? Finally, in view of the related research papers, the writer attempts to raise some new viewpoints and perspectives.

Keywords: *Cai Yuanpei, Peking University, the May Fourth Movement*